

- 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 安徽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WENYI BAIJIA

文艺百家

百家

2006.1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 安徽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WENYI BAIJIA

文艺百家

2006.1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百家 / 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安徽省文联文艺
理论研究室编.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1110-223-4

I. 文... II. ①安... ②安... III. 文艺理论—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3657 号

文艺百家

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编
安徽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468
发行部 0551-5107784
E-mail: ahdxchps@mail. hf. ah. cn
责任编辑 刘 云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11.7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110-223-4 / I·72

定 价 18.00 元

卷首语

在广大读者的热切期盼中,《文艺百家》2006年第1期又带着墨香与您见面了!从本期开始,《文艺百家》仍以丛书形式面世,由安徽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编辑,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期《文艺百家》栏目众多,内容丰厚,集中编发不少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的厚重之作。

首栏是“文学关注新农村建设”。这是当前文学界一个热点话题,我们安排了从不同视角阐述这一问题的文章。唐先田《坚守优秀文学精神》一文,从文学精神的高度,阐述了关注新农村建设,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作家的使命,作家在关注新农村建设的创作中,要立足“创新”这个基本点。对从事“新农村建设”文学创作的作家们,会有所裨益。

“专题研究”和“专题评论”是我们本期新辟的两个栏目,意在対安徽文学艺术家的作品作深入的探讨、研究、评论。

“专题研究”头条为老艺术家金芝先生的《一支红烛照千秋——〈中国徽班〉前言》,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多字的论文,对为京剧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of 徽剧,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阐发,其学养之丰厚、资料之广博、研究之精深、可信,都值得后学者重视和学习,值得我们向广大读者,尤其是戏剧爱好者、研究者推荐。

《孤独生命体验中的艺术升华——赖少其先生艺术人生及书法漫议》也是一篇厚重之作,作者傅爱国对赖少其先生革命和艺术的人生作了深入研究,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和见解,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当代徽派绘画、书法艺术的产生、发展都有学术价值。

“专题评论”栏,我们刊登了对《梨花似雪》、《归去来兮》和黄梅戏电视剧《李清照》的评论。就在本期付印之际,传来《梨花似雪》作者、著名作家鲁彦周去世的消息,我们谨以这组评论文章,向鲁彦周同志表达最后的敬意。

本期“艺术新视点”栏中时白林、钱念孙的文章,同样有深度、有广度,行文恣肆有变,学理性强,不失为艺术研究中的新收获、新成果。“文艺前沿”中吴尚华的文章《走向和谐:人与自然的主题变奏——试论当代文学中的环境文学》,对当前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新课题——环境文学,作了梳理和阐述,论题新颖,论断有新意,值得大家关注;黄佳能的《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脉动——对新世纪乡土小说叙事的现代性审视》,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表述,较深刻地阐述了所论问题,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还有一些可圈可点之作,不一一赘述。

本期《文艺百家》凝聚了我省老中青三代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心血,他们中既有年已八旬的老一辈文艺家、评论家苏中、金芝、时白林,也有钱念孙、唐先田、王宗法、赵凯、傅爱国等中年评论家,又有黄佳能、杨四平、吴尚华等文艺评论界的后起之秀,这种凝聚力显示了我省文艺评论界的团结精神与合作精神,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是我国当前思想文化领域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久前,省文联专门颁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全国媒体文艺宣传工作座谈会和省委宣传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提出《文艺百家》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关注世界,瞄准创作前沿,关注文艺动态,注重当代性和现实性,加强对我省优秀文艺家和文艺作品的评论、推介。我们将紧密团结和依靠我省老中青三代文艺评论家以及广大业余文艺评论工作者,切实贯彻、执行《实施意见》的精神和具体要求,努力把《文艺百家》办成我省文艺评论界的主要阵地之一。

读者、作者朋友,您对《文艺百家》有何建议要求,请及时告诉我们。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自己的这块园地,越办越好!

目 录

2006.1
文艺百家

卷首语.....	(1)
----------	-----

文学关注 “新农村建设”

坚守优秀文学精神.....	唐先田 (1)
农村题材三题.....	赵 凯 (6)
关于乡土的身份认同及其审美想象 ——兼论作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为和操守.....	胡功胜 (9)

专题研究

徽剧研究

一支红烛照千秋——《中国徽班》前言	金 芝 (14)
-------------------------	----------

花鼓灯研究

论安徽花鼓灯艺术的多元构成	赵 丽 毛洪生 (40)
---------------------	--------------

赖少其研究

孤独生命体验中的艺术升华——赖少其先生艺术人生及书法漫议 ...	傅爱国 (46)
----------------------------------	----------

专题评论

评《梨花似雪》

老树着花——读鲁彦周新作	李国文 (60)
“家国记忆”如梨花般灿烂	陈晓明 (63)
自觉追求“有思想的艺术境界” ——关于长篇小说《梨花似雪》至鲁彦周的信	谢永旺 (66)
倾诉与宣泄——《梨花似雪》读后	朱 晖 (69)

评《归去来兮》

- 登上更高的艺术境界——评完颜海瑞的《归去来兮》····· 何西来 (71)
- 历史小说创作的正道——就《归去来兮》答客问····· 王宗法 (76)
- 文学书写历史的张力——读完颜海瑞的长篇小说《归去来兮》····· 许春樵 (81)
- 长篇历史小说《归去来兮》研讨会概述····· 施晓静 (83)

评黄梅戏电视剧《李清照》

- 黄梅戏电视剧《李清照》的新突破、新提高····· 张苏洲 (86)
- 悲夫易安,壮哉清照——黄梅戏电视剧《李清照》观后····· 王蕴明 (88)
- 一次实践,一个梦想——谈黄梅戏电视剧《李清照》的音乐创作····· 谢国华 (91)
- 黄梅戏电视剧《李清照》研讨会概述····· 施晓静 (94)

艺术新视点

- 功崇唯志 业广唯勤——演奏家、教育家吴安明的民管艺术····· 时白林 (97)
- 桑建国的追求和意义——兼议当代画坛存在的“滥画”问题····· 钱念孙 (100)
- 扮演性与主体意志——关于王仁华人物画创作理念的解析····· 棠 樾 (104)
- 荷花悠悠蕴诗美——徐若鸿花鸟画评析····· 孙仁歌 (107)

艺苑纵横

- 现实激情与心底无奈——2006年安徽省小戏折子戏调演观后····· 安 子 (113)
- 郭德纲热的冷思考····· 谢德裕 (117)
- 浅议中国古典舞蹈的兴衰与传承····· 梁 宇 (119)
- 浅议杂技人才的科学培养····· 张成君 (123)

文艺前沿

- 走向和谐:人与自然的主题变奏——试论当代文学中的环境文学····· 吴尚华 (126)
-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的知识谱系····· 杨四平 (137)

学术新探

- “高山流水”话安徽——徽派古琴文化初探····· 王 丹 (146)
- 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脉动——对新世纪乡土小说叙事的现代性审视····· 黄佳能 (154)
- 绝望中的突围——文化撞击下的先锋文学精神····· 赵 蓉 (166)

序与跋

- 序跋三题····· 苏 中 (178)

坚守优秀文学精神

►唐先田

“农村题材”已成为文学界的热门话题,作家们正在为写好“农村题材”而思考、而投入,这是时代使命感、历史使命感的体现,也可以看作是一批好作品、大作品即将出现的前奏。写好“农村题材”,需要作家们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和努力,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如果要问,在多方面的准备和努力之中,什么是最关键、最紧要的?我以为,应将坚守优秀的文学精神,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

文学精神,看似很抽象、很概念化,实际上很具体、很深刻、很生动,并贯串于整个文学实践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中国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学艺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淀、不断总结、不断提炼、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优秀文学精神。这种优秀的文学精神,孕育出许多的优秀文学作品,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地走向和谐、走向繁荣昌盛、走向新的文明。优秀的文学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宝库里,闪耀着特有的光芒。新时期以来,党的文艺方针作了更符合文艺规律的调整,优秀的文学精神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光大,文艺百花园里出现了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但也不可否认,优秀的文学精神在商品经济的冲击和诱惑之下,不同程度地遭到冷落和淡化,因此,在“农村题材”成为创作的热门话题的积极情景之下,对优秀的文学精神,重新进行思考和认识,并作出坚守的强调,不仅对“农村题材”创作,就整个文学创作而言,也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优秀的文学精神,总是和时代精神融会在一起的,“农村题材”的创作,应将弘扬时代精神作为构思的灵魂。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可以用“太平盛世”四个字来概括。虽然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阴暗的、落后的、腐朽的等等令人烦恼、痛恨的东西存在,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正以巨人的步伐向前迈进,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历史学家对于如何认识一个时代,有几条评判的标准,那便是生产力是否提高了,经济是否发展了,国力是否增强了,人民群众是否安居乐业了,整个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通过我们每个人的切身体会,来对照这几条标准,我们都会感到,用“太平盛世”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国的经济持续28年稳定增长,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我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全世界刮目相看。28年是中国自秦汉以来治世最长的时段,这个时段,实际上超过了历史上有名的西汉文景之治、东汉光武中兴和唐代的贞观之治,而且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继续努力创造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条件,使中

国和平发展的治世继续延长。应该看到,我们走向新的复兴的决心和力量是无法阻挡的,对此我们充满信心。“太平盛世”这个时代精神,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共同基础,也是“农村题材”作品的基础。相对来说,在 28 年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的前进步伐稍觉滞后,和城市拉下了差距,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叫做“城市腿长,农村腿短”,但整个农村也都是处于发展进步之中,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现在党和国家又启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战略,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设想,采取了加大农村基础建设投入、普及农村教育、改善农村医疗等许多具体而有效的措施,我们有理由坚信,中国的农村一定会变得更美好,9 亿多农民的生活水平一定会有新的提高。“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应充分注意到这些基本事实,因为这些基本事实,和 28 年治世的辉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基本事实里,包含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当然,“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排斥描写和表现农民的苦难,因为农民确有许多苦难,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种描写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不是为了将丑陋当新奇,更不是拿我们自己的痛苦和创伤,去博得洋人的一笑。有的“农村题材”作品,在强调所谓原生态的旗号下,将农村生活写得低俗、龌龊,充斥着动物性的粗野与无知,缺少人性应有的理智和亮色。须知 9 亿多农民始终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和他们子孙后代的前途和命运,他们始终在为改变自己的以及子孙后代的前途命运而努力,他们在社会的底层奋斗着,虽然他们常常东奔西突找不准方向,白费了力气,也没有什么好的效益,但奋斗是他们的基调,这个基调是时代精神乐章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值得肯定的,也应得到作家们的支持与同情。农民们的奋斗精神,在党和国家的引导支持之下,已创造了不少奇迹,也一定会创造更多的奇迹,这应是“农村题材”作品的灵魂和主旋律。记住这个主旋律,把这个主旋律当作自己的责任,“农村题材”的作品便能较好地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优秀的文学精神便会在“农村题材”作品中散发新的光彩。

优秀的文学精神,总是和人文关怀融会在一起的,“农村题材”的创作,应对 9 亿多农民充满赤诚的关怀。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精髓之一就是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重要举措之一,是高扬着人文关怀的旗帜的。中国有 9 亿多农民,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农民的命运不改变,他们的收入不提高,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没有一个大的改善,奔向小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很难落到实处。这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与其他社会人群的生存境遇也息息相关。试想,如果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相对贫困的状态之中,富裕了的小部分人拉大差距去得到那种安逸闲适的小康,也将是十分不稳定的,只有全社会总体均衡地向前发展,才有稳定可靠的保障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广大农民报以赤诚的关怀,是整个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是包括作家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责任,关心农民,实际上是关心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因此,将笔力和精力投向农村,多写些“农村题材”的作品,绝非一时的应景之需,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整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宏伟而持久的战略中的一环。前一个时期,曾有过排斥“农村题材”作品的倾向,有的杂志将自己局限在只发表城市题材、情感题材小说的小圈子内,认为这样才有市场、才有卖点,这种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做法,带有明显的商品浮躁心态,缺乏应有的全局意识,和优秀的文学精神格格不入。从道义上讲,我们的文学也应当去关心、关注、描写农民。新中国的农民,不管自己的生存状况如

何,也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他们、对待他们,多少年来,依然那么真诚淳朴,依然那么富有韧性地奋斗,依然那么不由自主地作出自己的奉献,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快速发展,离不开农民有力的支撑。有经济学家统计过,中国人均土地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土地占有量的 $\frac{1}{3}$ 略强,中国人均水的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占有量的 $\frac{1}{4}$,土地和水,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中国农民就是在生产资料极为短缺的情况下,给每一个中国人提供的农副产品,包括粮食、油料、蔬菜、水果、禽蛋、肉类和水产品等,达到了世界人均水平的标准。中国人口那么多,试想中国如果要去国外买粮食和其他副食品,有哪个国家能供应得起,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可怕局面呢?由此可见,中国的农民是很崇高、很可爱的,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只要认清了这个事实,对于农民这个群体便会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解,便会对他们寄予由衷的关爱,我们的笔便会和农民和农村融为一体,“农村题材”的作品便会出现一个新的格调,一个和农民的命运血肉相依的格调,和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比较起来,是会有更多的、更切实的精神支撑和有益的实际举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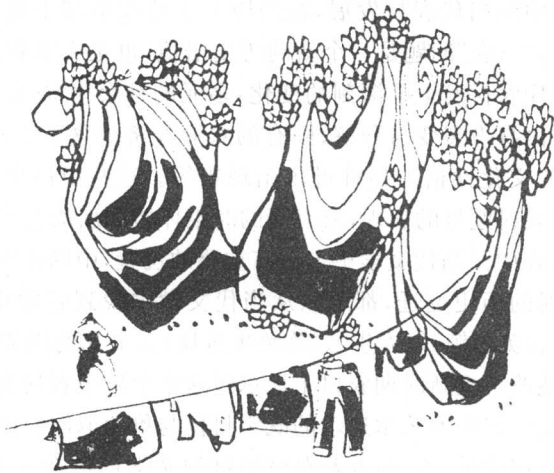
优秀的文学精神,总是和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融会在一起的,“农村题材”的创作,一个重要任务是塑造农村新人。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英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英雄,崇尚英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进取和希望,而那种所谓“非英雄”的理念,则是缺乏理性的颓废、没落的表现,对社会进步,对社会的积极进取,会起到一种消解的消极作用。在新时期的文艺思潮里,也曾有过“非英雄”的论调,他们将英雄人物贬为“傻帽”,将他们的英雄行为贬为“无谓的牺牲”,而热衷于叨叨絮絮、不厌其烦地描述那些“小资”们的卿卿我我与百无聊赖。这种文学情绪,不能说是正常的、健康的。正在变革的中国农村,有许多新的人物,他们中的一部分,堪称为中国农村的英雄、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农村题材”的创作,将注意力聚焦于他们,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华西村的那位老书记吴仁宝,可称为中国优秀农民的杰出代表;又比如那位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毕生与水稻、与农田打交道,他与农业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既是科技精英,又是农民们最忠实的朋友,他的辉煌使农民们引为骄傲。他们的情结、他们的故事、他们所创造的奇迹,难道不值得引为骄傲,难道不值得去浓墨重彩地书写吗?类似吴仁宝、袁隆平这样的人物,在中国还不知有多少,关键的是需要作家去发掘。美学家说,生活中到处都有美的存在,关键在于发现,农村新人也是一种美,也要去发现。当然,在中国的农村,仍然有许多如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二诸葛、吃不饱、小腿痛、亭面糊等人物,如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等人物,如《李双双》中的喜旺等人物,他们曾被称为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芸芸众生,被称为“中间人物”,认为文艺作品不应该去描写他们,这当然是极左文艺思潮的胡言乱语,新时期“农村题材”的创作,毫无疑问,要关注他们、关心他们、描写他们,但中国的农村,一定会有新时代的小二黑、新时代的生宝、新时代的李双双等模范英雄人物,他们便是吴仁宝、袁隆平式的人物,他们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息地追求着、不懈地奋斗着,他们当然是作家们描写刻画的主要对象,描写刻画他们,在于弘扬、激活农民的整体创业精神,中国的农村如此广大,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体是农民,但农民又是一个有些散漫的群体,农村的新人、农村的英雄,能以他们的思想、行为和人格魅力,将他周围的农民吸引过来,形成一股合力,农村新人常常是农民们的领军人物,如同吴仁宝与华西村的农民群体那样,有了领军人物,农民们的奋斗精神,便有了既定的崇高目标,是会创造出人间奇迹的,

如同吴仁宝创造的华西村人间奇迹那样令人惊叹。当然,描写塑造农村新人,应当符合生活的真实和文学审美规律,那种“高、大、全”式的所谓英雄,早已为读者所鄙弃,因为它违背了生活的真实,作为文学的经验教训,作家们对此是有更深刻的认识的,因此一定会写出有血有肉的、与农民呼吸与共的活生生的农村新人来。但作家们常常会出现一种困惑,有写好“农村题材”作品的美好愿望,有塑造农村新人的迫切企盼,但一进入具体的创作过程,又感到很茫然,甚至难以下笔,对农村只有一些零星的印象,只知道一些陈旧的故事,新人在哪里,新人是什么样的,感到朦胧而模糊。究其原因,是因为对农村不熟悉,甚至有些隔膜,农村所发生的那些生动的故事,在农村奋斗的那些鲜活的人物,只是从媒体里一鳞半爪地有所了解,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更谈不上感情的交融,也便很难将他们塑造成文艺作品中的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深入生活是说了几十年的一句老话,而且这句老话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文学创作的源和泉在哪里?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之中,只有现实生活才是文学创作永不枯竭的金矿,要写好“农村题材”、塑造好农村新人,唯一的途径便是到生活中去、到农村去,多交几个农民朋友,熟悉他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熟悉他们的饮食起居,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积累多了,自然下笔有神。近年间,一些在“农村题材”创作方面做出了成绩的作家,如叶广岑、关仁山、韩少功、陈应松等,都是在农村一泡多少年。叶广岑在陕西周至县挂职当县委副书记6年,她的感慨是“在农村越待越觉得传统文化的深不可测”,她写的《老县城》便较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生活;韩少功则干脆在湖南汨罗的一个山里盖了房子住下来,和农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写出了《山歌天上来》、《白鹿子》、《月光二题》等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陈应松是因为深入到神农架山村,才写出了《松鸦为什么鸣叫》、《马嘶岭血案》、《望粮山》等被称之为“神农架系列”的小说;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等也是在熟悉农村生活的前提下完成的;我省青年作家曹多勇,正因为他和淮河岸边的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才写出了《好日子》等“大河湾”系列小说。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没有一种机制能使作家深入到农村去,至多只是走马观花的采风而已。什么是机制,机制全在作家们的心中,你要是下决心写好“农村题材”、塑造好农村新人,便会自觉地打起背包到某一个乡村去待上一一年半载甚至更多的时间,扑下去、沉下去,一定会获取生活中的无尽宝藏。农村生活是苦一些,条件是差一些,但如果立下了写好“农村题材”的宏愿,这一切便算不得什么了,所谓创作是艰苦的,自然也包括深入生活的艰苦。艰苦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也是优秀的文学精神的体现之一。

优秀的文学精神,总是和努力创新融会在-起的,“农村题材”的创作,应着力于追求创新。创新是极其艰难的,但创新又的确是文学的生命,“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个“文”从字面讲可理解为“文采”,但文采就是创新,不重复自己,更不重复别人,形式、内容、格调,都独具一格而让人眼前一亮,这样的作品自然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就创作而言,创新是生活积累和聪明智慧的结晶,需要有独创精神,要敢于创新,要充满自信。中国的优秀文学精神,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创新精神,那么多经典名著之所以流传至今而保持着鲜活生命力,就因为它们都是创新精神的结果,“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中国古代诗人、文学家创作新精神的生动写照,他们是用生命来写作的,这种毅力和追求,应当发扬光大。创新的前提是要保持文学的独立品格。近年间我国长篇小说平均每年出版800余部,好的也有,但不多,能称得上有创新的则更少,读者们不能不从是否保持文学独立品格的角度去发出

追问。应当看到,粗制滥造之作、复制之作、趋利之作,的确不少。急功近利,是影响作家创新的最大危害。曹雪芹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境之下,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写成了巨著《红楼梦》,是一个伟大作家保持文学独立品格的杰出典范。调整一下浮躁心态,莫听大款大腕们钱袋的指使,遵循着文学自身的规律走下去,是会找到创新之路的。宏观把握整个农村的发展趋势,对“农村题材”作品的创新,会有很多帮助。作家们可以深入到一个乡村去,对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作细致的分析解剖,然后写入你的作品。但中国的农村千姿万态、各不相同,华西村独树一帜,有她的别样光彩,南街村又是另一种风范,还有山东青州的南张楼村,德国人在那里资助推广“巴伐利亚模式”,也别具一格,所有这些,宏观把握得多了,进入创作状态之后,自然会游刃有余。学习前辈作家的成功经验,对于创新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文学艺术,自有其独有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遗产极为丰富,很多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比如唐诗宋词那绝妙的声韵格律,那么优美、那么和谐,其他任何一种文字都无法翻译,外国人当然也就无法领略其中的意蕴奥妙了,我们都知道,写作诗词,是无须向外国人学习的。关于小说创作,学者们曾作了一个比较,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写了400多个人物,莎士比亚也描写了400多个人物,但莎翁的400多个人物是分散在30多个剧本之中,这400多个人物有重复的王侯、侍从及女仆等形象,所以性格大致类似,而曹雪芹笔下的400多个人物各具个性,个个栩栩如生;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比俄国果戈里的讽刺小说早了一百多年,至于庄子散文的夸张、浪漫,李商隐诗歌的朦胧、隐秘,更是豪放、优美无比。当然,我们也必须学习、借鉴外国作家、西方作家的成功经验,因为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个兼收并蓄的过程,融会得越多,便越有创新突破的可能。

坚守优秀文学精神,是职业道德操守的体现,是作家的毕生任务,谁坚守得好,谁就有可能做出更多的成绩来,“农村题材”的创作是如此,其他题材的创作也是如此。



农村题材三题

►赵 凯

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潮流中承担自己的时代使命？这关系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历史走向与审美选择。满怀激情地关注并投入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艺术地体现从农业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征程，努力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农村题材的优秀作品，这不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优秀传承，也是当代作家拓展自己的艺术空间、走出市场困惑的重要机遇。

一、农村题材的当代解读

关于当代农村题材的界定，应该具有新的历史内涵与时代特征。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关于当代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题材。“三农”问题在中国这个农业文明延续了数千年的国度里，是一个永久的社会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永恒关注的对象。但是，明确以“三农”的形式并列而并重地提出来，却必须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依据和支撑：城乡改革初见成效；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推进；工业可以支援农业，城市可以反哺农村……只有经历这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才成为可能。这是中国当代农村发展，在经历了土地改革与土地承包之后的第三次腾飞、第三次高潮。因此，“三农”问题是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也是文学题材的新的领域。近30年的农村改革，已使当代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元的社会格局，使当代农民获得了充分展示的平台；传统的农民身份裂变与分解；固有的农业经济观念发生动摇与变革；现代文明所催生的新一代农民的文化性格与精神诉求出现等等。这些由历史演进所带来的必然变化，要求我们的作家对农村题材的表现，要有新的时空体验和新的艺术视角。

农村题材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作家的乡恋情结是自觉而深沉的。中国当代农村的历史变迁，都可以从当代文学中找到它的审美折射与艺术见证。《暴风骤雨》、《三里湾》、《芙蓉镇》、《人生》、《陈奂生进城》、《平凡的世界》等优秀作品，已成为从建国前后的农村土地改革到新时期农村土地承包这半个世纪农村变迁的真实写照。使命意识与贴近生活成为这一代作家艺术追求的既定目标与价值取向。由赵树理、马烽、孙犁等创造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标志着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在艺术表现上的日趋成熟。这些都为文学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参照和文本范例。但是，历史的经验不能代替现时的认知与实践。在农业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当下农村的物质环境与精神生态已

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文学读者的审美趣味也在发生演变。因此以建设新农村为背景的当代农村题材创作,当然不能简单地重复赵树理、柳青等经典作家的创作经验与创作模式。新的社会关系与新的人物关系,为作家带来了新的审美选择与新的审美境界。因此,必须以现代眼光来审视和演绎当代农村题材,要从单一的生存祈求的局限中走出来,努力寻找在农村现实深处跃动着的历史脉搏,以体现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价值判断。

二、农村题材的边缘性与开放性

任何题材都是边缘的,都具有“间性”特征。在社会改革开放与文学价值多元的时代,文学题材的跨越性、交叉性与重叠性特征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对文学题材区域的硬性设定,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当代社会没有封闭的乡村,也没有封闭的城市。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意味与农民意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开始潜移默化。旧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实践证明这是严重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体制,正在面临着冲击与改革。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与脑体差别正在逐步实现绝对意义上的缩小,这正是实施建设新农村宏伟战略的现实基础与历史依据。因此,我们的作家所面对的当代农村与当代农民,有相当的成分,完全可能是正在逐渐城市化的农村和正在逐渐城市化的农民。这种历史的渐变与趋向,将最突出地表现在当代农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自觉认同与自觉实践上。30年的当代农村改革已在整体上提升着农村的文明程度,文明与愚昧已经不能成为当代城市与农村的绝对标志。传统的以农村的愚昧落后来衬托城市的先进文明的文学思维,或者以农村田园牧歌来抗拒喧闹骚动的城市文明的审美倾向,都已经不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现实,因此已不能构成当代文学实践的主导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开始走出农村的农民及其后代,愈来愈成为作家关注与描写的热点对象。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进城求学的农民后代、进城投资或经营的农民企业家……他们的人生变故与命运遭际都已成为生动而感人的文学素材,成为文学作品中不可忽略的一道风景线。这些走出乡土的农民,他们试图通过迁徙来改变命运,但融入城市的艰难也许是他们远远没有想到的。新的生存环境的适应与新的社会身份的确认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困惑,甚至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的追求与探问,正在演绎着新一代农民或者说新一代工人的人生轨迹。

农民工现象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成为文学创作关注的对象,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必然性的。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率达21%。1亿左右的农民工占第二产业岗位的57.60%、商业和餐饮业的52.60%、加工制造业的68.20%、建筑业的79.80%^[1]。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当代产业工人结构中的重要成分。这些亦农亦工的农民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他们的根还扎在农村,他们的命运牵动着农村的父老乡亲,牵动着新农村建设的整体实施,当然也属于当代意义的农村题材的范畴。

三、农村题材“写什么”与“怎样写”

笔者认为,一切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关的人物和事件,都可以进入作家创作的视野,或者作为文本的主体内容,或者作为背景依据。问题是题材的选择与确定,要符合文学自身的规律与当代的审美理念,文学的意象也必然是作家艺术体验与艺术经验的融合。

原有的“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以及“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等创作理念与创作现象,都已被文学实践证明是“非艺术”与“非审美”的。因此,艺术表现“三农”问题,应该成为恪守良知、尊重现实的文学家自觉的审美选择。要置身于建设新农村这一伟大历史实践的潮流中,贴近农村、亲近农民,使浓郁的乡土气息与淳朴的农民情怀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精神血脉。只有这样,我们的创作才能获取新的历史语境和新的文学叙事。

努力刻画正在成长中的当代农民的艺术形象(新人形象),仍然是当代农村题材文学特别是叙事类文学创作的首要追求。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必然会催生新一代农民的显现。文学作品要写出他们的性格成长史,写出他们情感的流程与灵魂的蜕变,写出他们实现精神超越所赖以存在的形式——脱贫致富的奋斗历程,并以此来观照当代农民整体的物质生态与精神生态的演变。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是艰难的。传统的善良、勤劳与坚忍的品格守护,市场经济竞争法则的冲击与碰撞,酿就了当代农民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with 丰富性。在文明演进中守望甚至落伍的农民,依然应该得到深切的关注,而那些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勇于开拓与创造的新农民,更应是我们文学家艺术视野的焦点,因为他们正是当代农村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体现者,引领着新农村发展的潮流。

如何处理农村题材写作中“歌颂”与“暴露”的关系,这涉及如何准确地把握当代农村的现实与发展趋势的问题。对于作家来说,既要有当代意识的观照,又要有历史眼光的审视,既要有人文关怀,又要有批判精神,既要有艺术的揭示,又要有理想的胸怀。因此,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歌颂”与“暴露”,我们不能以简单的数学概念来设置比例关系。不能以“阴暗的创作心理”、“拜金主义的结果”等简单的指责,来评判那些具有批判锋芒和否定指向的农村叙事。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文学现象是由特定的历史情景造成的。“三农”问题依然是严峻的,新农村的建设是艰难的历程。一方面旧有的封建意识的土壤,仍然在滋生着新的贫穷、新的愚昧;另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在给农民带来新的命运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诱惑、新的矛盾和新的冲突。在历史的转型时期或现代化的初期,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境遇,仍处于弱势地位,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因素。马克思认为,旧时代的悲剧是表现崩溃中的苦难,而新时代的悲剧是表现“新世界诞生的苦难”,即表现创造中的苦难。表现苦难与批判罪恶正是迎接新时代所必需的。但是,批判与肯定是相反相成的。批判丑恶就是为了肯定与歌颂美好。当代农村题材的创作所以相对沉寂、相对郁闷,固然有多种原因,但理想主义的失却、对时代生活特别对农民生活激情的淡漠,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的确不能忘却那荒谬的年代给文学带来的腐蚀——文学离开了真实的根基与性情,伪理想主义情感泛滥成灾。但我们的创作理念与审美主张绝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让苦难埋没理想。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必然会为我们的文学家提供一个理想的蓝本。

当代农村题材的创作,是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全球化语境相联系的,它同样也不可能回避新的读者群体与文化市场的范式与要求。新的描写对象、新的审美趣味催生新的文学叙事。写实主义的艺术张力没有消失,但我们也可以尝试超越时空与整体象征等新的艺术体验与叙事手段,使农村题材的创作获得新的审美空间,为不同欣赏趣味的读者群体所喜闻乐见。

注释:

[1]章旭莉:《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的路径再选择》,《学术界》2006年第2期,第143页。

关于乡土的身份认同及其审美想象

——兼论作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为和操守

►胡功胜

周作人在1923年连续发表的《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中提倡“乡土艺术”，明确提出“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充分张扬“风土的力”，将文学的“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统一起来。他的主张对中国的乡土小说的发展具有某种范式的意义。正是“五四”作家的一批略显粗糙的“乡土艺术”文本，开创了中国新文学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在其后续的乡土文学中，似乎并没有多少作家、多少作品达到了这样的艺术标高。

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以人本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表现了一种深层的悲悯和忧愤深广的情怀，先驱者们以他们睿智的目光洞悉了所谓“仁义道德”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1]这种“人”的集体“缺席”自然也就带来了种种人间的苦难。对此，启蒙主义者“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2]对旧世界发动摧毁性的攻击，开始在中国“辟人荒”，“从新发现‘人’”，^[3]也就是那些生存于大地上的平凡的人、最下层的人，开始关注“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4]这时，乡土世界便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文学先驱者们的视野，传统大地上的劳作方式（农业）、乡土（农村）和乡土上的牛马人生（农民）便成为一股文学思潮的审美观照对象。有幸的是，文学的“三农”问题在它的始发地就得到了人道主义的关注。作家们展示了悲凉乡土大地上一个卑微的文化群体、一个个鲜血淋漓的人生惨剧、一幕幕冷酷无情的乡间习俗，把中国社会“特殊的风土人情”和“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5]显影在文学史页中。

在其后续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中国革命现实的需要，乡土一度摆在主流话语的核心地位。从“左联”而至20世纪40年代从抗日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一批批乡土作家，尤其是赵树理、孙犁以及周立波、柳青等，他们共同开创了中国乡土小说的一个政治模式，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新时期文学发端的前夜。作为乡土小说的一个经典性文本，《暴风骤雨》把农村复杂的人际关系界定为阶级关系，而且把地主与农民的矛盾看成是唯一的矛盾，在作家眼中，地主之间、贫农之间似乎不存在矛盾，这样，矛盾的双方营垒分明，阶级阵线就像政策条文规定一样清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作家没有看到生活固有的复杂性，恰恰相反，在他生活的农村，他看到土改中发生过“左”的偏向，但作家认为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而应加以“省略”，扬弃生活中消极、复杂的现象，以一种更纯粹的艺术方式塑造“典型”，这也就是中国的乡土作家操持了几十年的本质论。这种“本质论”的发展

极致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高、大、全”式的艺术钳制。但是,批评界长期以来对这种模式的阐释也是很不到位的,没有充分认识它们所包含的一种对立性的审美品质:一方面,这种写作模式没有真正把握历史与现实的本相,人的丰富的主体性淹没在对本质的片面揭示中;一方面,由于这批作家与乡土融为一体的身份认同,有可能使他们成为乡土本相的最直接的呈示者,在一些细部达到与历史本质的真正吻合,这正是其后续几十年中乡土小说最缺少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乡土文学自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人道主义的价值评判还是相对弱化。

人道主义对乡土的再度审美观照发生在历史的“新时期”。从“凤阳”这块土地上发出的变革现实的呼声迅速席卷而为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思潮。随着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全面展开,人道主义旗帜被再度竖起,多灾多难的乡土地再一次成为人们否定极左思潮的特有文化视角。作家们用乡土的“伤痕”去否定政治失误,用乡土的“反思”去揭示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戕害、对价值主体的粗暴践踏。“李顺大”是这个思潮中最感人、最生动的形象之一,这是一个典型的丧失了个性意识和个人意志的“跟跟派”。几十年来,他省吃俭用,目的是自己能建三间瓦房,而一次次政治运动一次次摧毁了他原本清晰的价值世界,最终只剩下灵魂丧失后的麻木和盲从,再也不敢有自己的打算。当人们再也不愿无视落后贫穷,再也不愿忍受乡土的积重时,那些曾经置身乡土的知识分子立即“产生了对故乡反叛情绪,一种仇恨的审视”。^[6]逃离乡土、跳出“农”门成为一种时代情绪和一代青年奋斗的动力,这时的城市成为一种价值标识。也许就是从这时起,人们对于乡土的崇高想象开始轰然崩溃,所以,已经接受城市文明熏染的“高加林”注定无法与“刘巧珍”走到一块,“巧英”也必定要离开那个“孙旺泉”的,这不是命定,而是受制于一种新的价值规律的重新组合。所以,当“返城”、“高考”、“参军”及至后来的“打工潮”等等各种选择为新的价值实现提供可能的时候,人们表现了义无反顾的勇气,逃离乡土开始作为一种生存的“突围”。

这个时期涌现出的大批乡土小说作家,带着他们厚积薄发的作品,纷纷崛起于文坛,如高晓声、何士光、路遥、张一弓、周克芹、贾平凹、刘恒等等,与乡土长期亲历性的联系,使他们的叙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当时的农村改革并行,及时地表现这场社会变革的矛盾和走向。但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文化也以它固有的优越性对乡土文化进行着冲击和埋汰。在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一个曾一度对乡土文化进行着乌托邦式建构的国家,一旦人们回过身来,乡土文化的劣势便立即暴露无遗。而且,从乡土文化的言说主体来看,上世纪80年代早期涌现出的大批乡土小说作家,几年以后基本上一个个地以他们的成名作占据着城市里的一个个文化位置,乡土生活的现场性一下子就背景化,他们就只能依靠对乡土的记忆和间断性的生活体验去叙述仍然变幻莫测的乡土生活。当他们感觉到自己力不从心时,便利用叙述上的成熟对乡土进行着想象性的书写。所以,有人把进入90年代的乡土小说分为“现实乡村小说、生存乡村小说、文化乡村小说、家园乡村小说”,^[7]严格来说,它们对于乡土自身的丰富性而言都是不完整的。如寻根的文化乡村小说,虽然它们使乡土生活有了点形而上的味道,有一定的超越性,但它客观上形成了乡土小说与现实生活的隔膜,乡土现实的诉求得不到保证,而现实乡土小说,它们的视点很低,基本上是采取与乡土现实生活平行的视角展开叙事,但这批作家似乎在现实生活中陷得太深,入乎其内而难出乎其外,经历的琐碎、杂芜中很难